

##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五)

费孝通

### 十四、派克老师走上讲台

派克老师是1913年以神学院教授级讲师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看来这个地位的教师并不需要开课讲学。这年他只在大学里以“从黑人看种族混杂”为题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可以说这是他以社会学者身份在新的学术园地里亮了相。同时也标志着他是从研究美国黑人问题为入口正式踏进社会学这个学科的，而且也说明他是用他在美国南方脱斯开奇工作的七年里和当地黑人亲密接触中得来的亲身阅历为基础上台讲学的，实践了他生活里出理论的主张，而且也实践了他在结识引进他入芝大的汤姆士教授时约言，一起研究种族关系来开拓社会学的研究阵地。他和种族问题在一生中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上面的札记中曾提到派克老师离开脱斯开奇之后，进入芝大之前，还特地去英国南部诸州考察黑人教育问题，这表明了他对美国南方的黑人恋恋不舍。

派克老师虽则后来一直被公认是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奠基人，但是他和芝大社会学系建立关系也经过了曲折的历程。他直到1923年才取得社会学系教授的地位，离他初进芝大的1913年有10年之隔。其间人事上的细节，我没有打听过。据我所知道的，1914年他已经开始在系里开课讲学了。他所开的第一个课程是“美国的黑人”，很明显是他在上一年公开演讲的继续。

按大学的惯例一个学系在开学前要公布这年所开各个课程的内容提要。派克老师这门新课程的内容据公布的是：“特别着重探讨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接触的结果；奴役和自由，

试图分析当前的紧张关系和发展倾向，并估计这种种族关系变化的性质和对美国体系的影响。”

这样一门专门研究美国黑人的课程当时在以白人学生为主的美国大学里是空前的创举，也是独一无二的。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要在大学里把种族问题列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题目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为我们知道即使经过了已近一个世纪，种族问题特别是有关白人和黑人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是个不敢轻易触及的禁区。派克老师在芝加哥大学这块学术高地上扯开这面大旗，没有深切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是办不到的。

我在这份札记的上一节里插入了一段关于派克老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美国参战后，接受过当时的校外研究任务参与《促进美国化的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其实还是和他的种族关系研究一脉相通的。这是研究战时欧洲移民后裔怎样融化为美国人的问题，本质上和美国黑人的种族问题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生活时怎样通过接触、冲突或融合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只是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有所不同罢了。其实派克老师1904年在哈佛大学当助教时，在波士顿参加反对比利时国王虐待非洲刚果黑人而组织“刚果改革协会”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世界上的种族矛盾而决定了自己研究的方向，就是19世纪已存在至今尚未解决的不同文化和民族因互相接触而发生一系列问题。这正是派克老师在芝大所开的第一个课程所要讲解的内容。美国欧洲移民的美国化问题也应当纳入这个大范围内的，其实这个基本问题的研究一直贯彻了派



克老师的一生。如果联系他后来在30年代的东亚旅行所提出的太平洋沿岸直到印度和非洲一带的种族相处问题，使我联想到当前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所引起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脉相通的，都是这个地球上人类在发展中经历过的同一问题。从这个线索上去理解派克老师所开辟的学术阵地，就会更亲切地感到他抓住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问题的关键，更见得他早就怀有宏伟的远见了。

派克老师的一个有名的学生Everett Hughes曾在回忆这位老师时写道：“美国社会学的特点是能从令人新奇的琐屑事实里看到世界宏观的整体，从个别新闻事件里看到新闻背后的东西，从而结合到理论加以发挥，派克老师比他以前任何人都更能做到这一点。”

“派克突出的本领也许可以说是在他能打通记者和哲学家两者之间关系。在他的脑子里，没有一件微小的人事不会引起他最深奥的哲理推论。比如我曾在一篇论文里按商品集中数量的大小来排列伦敦、纽约等大城市的序次。派克把这一论点引用到美国内地的情况而且说这里也有较小的中心的辐射作用，这些中心都以其经济能量控制着四周的腹地，从而发挥了中心对腹地的作用。他能由大到小看到了一个城乡网络。他的伟大之处也许就在他能从自己经验中的微小事件看到整个世界而把双方联结了起来。具体的东西都能用广泛抽象的话语说出来。他的头像是伸在哲学的云端里而他的双足却站在芸芸众生的土地上，他慢吞吞地在肥沃的思想中运行。事实上，他似乎想把哲学的思想和人间众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16年派克老师除了继续开讲有关种族问题的课程外，又增加了“新闻媒体”、“群众和公众”和“社会调查”等三门课程。我们可以说，在这几门新课程里他又抛出了储存在他知识库里的另一部分积蓄，就是他用了作为新闻记者的11个年头所得来的丰富阅历。他对这一部分储存一直是十分宝贵的。因为他时常怀念他的老师杜威博士，并一再提到研究新闻媒体是杜威老师给他出的题目。

他在“社会调查”这门课上一贯强调参与

调查，就是直接去接触和观察市民的生活。当学生们开始实地调查时，他总是要跟他们一同下去，至少要一同去一次。他是个健步的人，当时可能不像目前的城市居民那样常常以车代步。在20世纪早期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动，也许还是美国城市生活中一项普通的运动项目。派克老师经常自称他也许是美国人中在城市街道上步行的里程最多的一个。有个学生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意大利移民区的边上走过一个破烂的仓库区时，他大声向我讲述这个区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有点像是自得其乐地自说自话。”他又经常赞赏城市说：“城市毕竟是文明的人居住的地方。”意思是人类的文明是城市的产物，他又常常喜欢重复Spengler的话，“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城市产生的。”和“世界史是城市居民的历史。”他所说的世界史不同于人类史，指的是人类的文明史。

从1921年到1931年芝大社会学系研究生中有15个是以芝加哥这个城市为试验室，进行调查编写论文的。其中有七篇论文后来出版发表，其中三本由派克老师写了序言，畅销了50年的那本Neil Anderson写的The Hobo是其中之一。由派克老师指导的关于种族关系的论文有42篇。

派克老师在学生论文出版成书时写序言的在《派克传》附录里提到列举的有14本，（从1917到1940年）。1971年出版的《黑人社会家学》The Black Sociologist，一书有专章称作“派克传统”列述美国最伟大的黑人社会学家，其中有二个是派克直接的学生。

S. Lipset在1950年评论派克的文集《种族和文化》时说“如果过去40年里美国对种族问题的气氛和舆论有了变动的話，大部分应归功于派克和他的学生，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种族问题上形成了美国社会学上最深的记印是在派克鼓励下他的学生们对各种种族和民族团体的研究和结果所形成的。”

## 十五、奠定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

派克老师一生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成名之作



是他那本巨大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这本《引论》原是为初入大学的学生准备的引导他们进入这一门称为社会学的学科的基础课本。在我进入大学的30世纪30年代，据我所知，一般大学都极重视这种入门课程，总是由学系里能力最强也所谓最叫座的教师讲授，这一课讲好了，学生就安心在这门学科里上进了，学系也欣欣向荣，正所谓吃香了。如果不能在这门课上收拢学生的心，那就会影响到整个学系。我在“决心补课”这一节里也已表达过，由于我是个半途出家的和尚，在初入大学时没有念过社会学概论这样的入门必修的基础课，因而自感底气不足，老来受苦。所以决定重新找到派克老师这本《引论》做为补课的入口。这个决定是一年多以前做出的，经过这一年的补课，自认为这项决定下得是不错的，对我是有益的，因为自己觉得这一年里我的确有不少新的思想在发展之中。在我这一年里所写的文章中也有所流露。按传统举行的90生日的欢叙会上，朋友们又把我这一年的写的文章集成《九十新语》那本小册子，已印成四集，可以作证。

说到派克老师所编的《引论》这本书，从书名本身起就得注意和多想想，它的原名是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直译成汉文是《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读起来似乎有点别扭，因为英文里的Sociology现在普通都译作社会学。英文Sociology是由两个拉丁字根Socio和logy组成的，Socio即社会，logy即学科或单称学。为什么派克老师偏偏在Sociology前加上一字Science一字，Science中译是科学。所以这本《引论》的全名成了《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派克老师加“这门科学”这个语词是不是犯了语法上的重复意义的毛病呢？因此我们对此要多想一想。

书名上标出“这门科学”的用意在本书并没有直接加以说明，对此我只能自己揣摩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科学一词的特定意义，在人们思想中不同时代不是一致的。派克老师所处的是20世纪初年的美国。当时美国的思想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对社会学这一门学科怎样定位还没一致的见解。据我所知道的，派克老师最感

到恼人的是把社会学看做是一门对付当时社会上出现不正当现象的学科。当时美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初期，社会上发生着种种传统眼光里看不惯的现象，群众中对这些被认为不正当的现象有着强烈的反感，当时的传统意识又深受美国早期移民清教信仰的影响。当时的社会学家包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Small本人都是个受宗教信仰影响较深的人。派克老师却坚持欧洲文艺复兴中兴起的理性主义的信念。他对那些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整风派很有反感。把它称作do-goodism“做好事主义”他甚至说芝加哥城里最大的破坏者不是那些腐化的政客或犯罪者，而是那些口口声声闹改良的老娘们，他讨厌这种高唱做好事的人，因为他们不去分析形成社会不正当行为的原因而妄作主张。读者也许还记得他在当新闻记者时采访过一个因酗酒的女犯。他发现酗酒是一种相当于社会上的传染病。他认为社会学者不是一个头痛医头的走方郎中，而是个对症下药的医生，这是他要强调用理性来对待社会现象的科学态度。他在《引论》书名中标出他所讲的社会学不是那种讲做好事的说教而是用理性来对待社会现象的科学。我作这样的推测不知道是否符合老师的原意。我这样揣测是出于我回想起我在高中念书时所喜欢阅读的当时的科学和玄学的论战文章。当时我一知半解地站在科学一边，把它当作真理一般来对待。那是五四的余波，来源于当时由胡适引进的杜威这些西方思想，认为科学就是讲理知，也就是讲道理的，和迷信联系在一起的玄学相对立。用我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来推测派克老师的用心，可能有一点史距和时差上的错误。但如果我的揣测有一些道理的话，21世纪的头10年美国思潮就和我们五四之后的10年差不多了。当时美国的社会学派作为一门科学还在成长之中。

接下去我们可以看看派克老师怎样开始编写这本教科书的。1916年这段时间里派克老师已经在芝大开课，上堂讲学了。除讲种族关系外新添了几门有关新闻媒体和城市调查等课程。这年发生了一樁偶然事件。在芝大社会学系来了一位新得博士的青年人，年方30，被聘





为助教，而且还要他开讲一门社会学的引论。按我在上面的说法，由这样一个年轻助教来讲《引论》似乎是出格的，因为这一门入门课程一般不会交给这样一位新手来担任的。这位新手名叫布吉斯（Ernest W. Burgess）。他当时也感到很困难，所以去找一位讲过这门课的Bedford教授，想要他的讲授提纲作参考。Bedford教授却拒绝了他。他不得意回头来找派克老师，当时派克老师已56岁，这位老教师却一口答应合作，因为他对当时流行的社会学入门课本很不满意，认为太不够水平，而且太沉闷无味，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其实我猜想他还有一个更深的想法，因为他看中了芝大的这批青年学生。认为他们有朝气有创造性，正可以吸引他们进入他念念不忘的思想领域里的探险，成为一股创业的力量。

为什么我这样猜想呢？理由是我在以上的札记中已伏了根，引用过他给他儿子的信，和他一再表示的要利用他在大学里这个职位来整理他知识库里的贮存，形成一个理论系统。他认为这位年轻讲师布吉斯的请求正是他自己的创业机遇。

派克老师对编写这本引论是十分认真的。他在这本书的序里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他的志愿。他说“这本书不应看作是很多材料的堆积，因为它是一个体系的论述”。这个体系的论述由一系列包括了从广大社会组织和人们生活的事实里提炼出来的社会学概念所构成的，这个体系就是社会的科学Science of society，社会的科学是派克老师心目中的社会学也就是在这本书要引导学生们进入的成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

为了给这门科学在诸多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定一个位置，他在全书的本文之前加了一章称作“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说的科学的社会学是由一系列概念所构成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这本《引论》主体部分从第2章起到14章，包括构成一个体系的13个社会学概念，每章讲一个概念。他在该书的序言里说：“除了第一章外，每一章都包括四个部分：（1）引论；（2）资料；（3）研究和问题；（4）参考书目。前二个部分

目的是引出问题而不是作出答案。其后二个部分是进一步启发提出问题和阅读资料。参考书目主要是为了提出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所以选择一些著作以供参考。”总之，派克老师心目中是为指导一个新加入这个学术队伍的人怎样一步一步地踏进这片知识领地。他一刻也不忘记这是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没有现成的定论可以用来灌输进新学者的脑中，只有启发他们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去耕耘这片土地。但作为一个指导人，他要把自己的思想以及前人的成就去引导他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逐步引成自己的思想成果，充实到这门学科中去，促其成长。这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方法，是派克老师的老师杜威所提倡的。

更令人感到这位老师对学生们的关心和厚望的，是他在每一章的最后还要提出一系列可以作为写作的论文题目作为结束。从启发性的导言开始到论文题目的提示，划出了一个学习的具体历程，也是一门学科的具体生长过程，派克老师在开风气，育人才的事业上真是做到了家，实在令人惊叹不止。

我在补习这本《引论》时一直感到一种大师的魅力，我不仅看到了这是一本1040页的大书，而且还看到这一本从1921年出版起到1970年还在重版的经久的读本，半个多世纪中不知有多少本书传播在这个世界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中学得多少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知识，帮助过多少人因为得了这些知识而提高了和丰富了他们生活内容。这笔账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当然我是不可能用数目来表达出来了。

让我们再回到1917年补说几句，派克和布吉斯，一老一少一起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按他们的设想，开班授课了。当时这书还没有成型，只能一面按期上课，在班上用散张印成的讲义分期分发给学生，接着上面所说的过程进行学习。每上完一段课，这两位老师引导着学生们进行讨论和写报告，收得了一个个学生的反馈。两位老师合作修改讲义。一年复一年，一班复一班，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他们把广大的学生引进了编写这本《引论》的队伍，也就是建设这个学科的圈子里，由于派克



老师特别重视讨论时要结合实际生活发言，通过这样的反复试讲和讨论，积聚的智力能量是不易计算的。这种编写课本的方法也许是派克老师所独创。在这种方法里出力的人是众多的，受益的人为数更多。

到了1921年，经过了五年的试教，这本《引论》才改变用油印散张分发讲义的形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成书本正式出版发行。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一本绿色布面的精装本是1932年6月发行的第三次重版本，由吴文藻老师在美国买来和后来保存并传给我的。

我手头这本书，全书共14章加上附录的参考书目，拟出的论文题目和讨论的问题，一共是1040页，真是沉甸甸的一厚本。据有人统计其中所搜的资料摘要共196篇，所引用的著名学者有10位。说是一个教科书，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本社会学的大百科全书。

他并不满足于这个社会学的体系，总是说作为一门科学，现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他引用 E. Westermarck 在1901年说的一句话，“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他接着这个意思说社会学是个在成长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他把20年代的社会学比作在引进实验室之前的心理学和在Pasteur发现细菌之前的医学。因为他看到当时社会上发生问题时还是靠常识来应付，并不经过客观研究和用实验方法去对待。这使我回到上面提到的为什么他把这本入门的课本称作《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引论》。

这本《引论》可以认为体现派克老师愿意当社会学这门科学的保姆的角色。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去培育它成长起来。他充分意识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所以他采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充实到这个学科的奠基工作中去。这本《引论》的编写过程中还要自始至终拉着布吉斯这位青年人合作，并列为该书的著者，而不愿单独具名。这又是值得我们应当深思和学习的学者之路。

## 十六、众口交誉的老师

上一节札记里我讲到了那本我用来作为补课入门的课本，也是一般认为是派克老师成名之作的《引论》时，在那节札记结束时提到了这书的著者问题。过去我们在燕京大学曾听过派克老师课的这辈年轻人中，总是喜欢提“派克社会学”的说法。派克老师返国后，1933年我们这批学生还出过一本纪念集，直称之为《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在当时心目中这本《引论》就是派克社会学的代表作，也奉之为社会学的经典，而实际上这本著作却并不是派克老师用个人名义出版的。现在翻开这本厚厚的大书，可以看到首页书名之下所标明的著者明明有两个名字，一是Robert E .Park (派克)接下来是Ernest W. Burgess (布吉斯)，说明这是本集体著作，至少是两个作者共同的成果。这件事在我补课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上一节札记里已讲过这本书产生的经过。首先是出于布吉斯的要求，派克老师同意和他合作一起开课，那是1916年的事。按他们共同制定的授课方式和大纲，并一起编定讲义，用油印的散页在班上发给学生，再通过和学生一起讨论，逐步修改。经过五年的试讲，到1921年才正式成书出版，其后又多次重版。据说经过半个世纪至1970年还重版了一次，这时派克老师和布吉斯都已不在此世了。

这本《引论》其实不仅出于派、布两人之力，说是集体之作是一点不过分。这个集体还应当包括他们班上所有参与思考和讨论的学生。但是话还得说回来，这个集体中主导的领导，不仅出力而且出思想的，我想还是以派克老师为主。可是他意识到这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所以不愿以个人名义独自居功和负责。他这种精神对我国当前的文风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我对我国当前学术界竟有自己不动手而在别人作品上签名为著者，用以达到沽名钓誉，提级加薪的风气常使我十分痛心。因此，我在写完上节札记后，还特地翻出罗森布什的《派克传记》查阅所附派克老师的著作目录，发现他那些重要的传世的著作都一如《引论》都是用若干著者的名字并列的方式行世的。比如为汤姆士恢复名誉的1921年重版的《旧世界



特徵的移植》是用派克、汤姆士和密勒三人具名为著者的，又比如被誉为城市社会学奠基之作的《城市——在城市环境中的人性研究的建议》是派克、布吉斯和麦根齐三人具名的。避免独自居功的精神似乎已成为派克老师的惯性，充分表现了他个人事业里重视社会的作用，也可认为他自己对社会学的活学活用的一种优秀表现。在道德水平上说和那种假冒伪劣的世风，作出了事实上的贬责。

他这种不自居功乐于成人之名的雍雍大度的风格使他和别人合作同工产生一种强劲的亲和力。同时也加强了伙伴间的凝聚力，反过来他在同人间也成了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在他周围总是融融的一片相互吸引的团结气氛。充分表现在他的学生们对他的热诚敬爱之心。

有一位朋友知道我在温习派克老师的社会学著作，特地给我送来一份复印件，是他偶然在一本《美国社会学传统》中见到的。那是这本书的第四章，是Helen M. Hughes所写的介绍派克老师的文章。我没有见到那本书的原本，（所以不知道该书著者是谁）这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她和我在1943年在哈佛大学附近见到的和送我那本《派克传记》的Everett C. Hughes是一家人。她在文章里说她是派克老师1920年代的学生，跟他往来有5年之久。她一贯用当时一般学生对这位老师的尊称作“派克博士”。她记得这位老师把“教室变成了酝酿新思想的园地。他要求每个学生都作实地调查，作有系统的观察和记录。”

这位休斯女士在文章中还记着派克老师和布吉斯和学生们一起听神经学教授C. M. Child在一个研究生的集会上的演讲。讲到某种昆虫的神经系统时指出昆虫的各种本能冲动怎样受大脑这个中心的指导，大脑接收外来信号后向全身作网状辐射。派、布两位老师当场就采用这个观念并应用到都市研究上去。他们说都市就像一个生物体，道路等于神经系统。城市的中心地区通过道路影响边缘地区和邻近城市。Child教授后来又说外来的新事物是通过中心来带动外围的，两位老师接着就发挥说，城市中心对新事物、新生活方式、新人口、新消息，

新资料的抗拒力最小，所以最容易被侵入。这些新东西再从中心送到四周，形成邻近的“转型带”，一波一波的向外推广，直达郊区。

上面这段回忆生动地说明派克老师是怎样从多方面去接受新的思想观点和概念来充实他自己的社会学。所以这位学生说，“我们的老师事实上等于一个师生合作事业中的资深伙伴，……派克博士的角色是开头带路。”

她又说“派克博士上课从来不读讲稿，他的很多观念是在课堂上根据一些手写的笔记当场发挥出来的。……他也常讲记者时代的轶事给大家听。他对于田野工作乐之成癖，永不厌倦。”

这位学生把这些细节写下来的目的是要说明：“派克博士把学生当同事看待。他和学生经常保持联系，对每个人的研究工作都很熟悉。

这位学生最后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谦虚为怀，毫无骄气。他为人合群而有活力。做起事来总是兴致勃勃，毫不拘谨。”

另一个1915年起就长期跟随他学习的黑人学生叫约翰逊说，“我在他那门《群众和公众》的课程上最初相遇，我们过去并不相识，对他的为人更不熟悉，但在课堂上我却被这位老师抓住了，真是心悦诚服。不久他那种平易近人，一见如故的态度吸引着他的学生们，我就是许多有机会一直跟随他一路请教不断交谈直到办公室的学生们中的一个。有一次一同散步时，我发现自己似乎茅塞顿开的懂得了怎样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溶入广泛的社会知识之中。我油然地觉得有一种豁然贯通之感，一点不觉得是外来强加于我的。这种师生之间的关系等于是朋友之间友谊。”

1924年有一个美国南方来的学生名叫汤姆生的来念派克老师那门关于美国黑人的课程。他在派克老师办公室里听他和学生们谈话，他记下他的印象：“一个学生来找他请教有关论文里的问题。派克博士却总是反过来问他个人的经历，一生的背景，他一直不断追问，最后这个学生突然想起了一些过去从来不觉得有意思的往事，像点着火一样把自己的意识燃烧了起来。”





这位老师一般总是平心静气的和学生对话。但有时他听得不顺耳时也会跟人顶嘴，但从不记在心上。比如一位名叫卡伊顿的学生，他是美国第一个黑人参议员的孙子，有下面的回忆：

“我最初是在太平洋海岸华盛顿大学里遇见派克的。有一位教授介绍我和他谈话。我向他说明我对黑人历史有兴趣。他回答我说黑人那里有历史。这使我大为震怒，我回答他说，人都有历史，即使是我坐的那把椅子也有它的历史。我从此决心不再见他。但几年后我到芝加哥大学，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张开两臂欢迎我。原来他当时是想触动我一下。后来这位学生和Drake合作写了一本关于芝加哥的书，书名是《黑人的都会》。”

派克老师是颇为幽默的人，他最讨厌装腔作势，心胸狭窄的人。他不时用嘲弄的口吻来讽刺人，目的是在激动他。所以有人说他和萧伯纳很相像，甚至把两人的姓联在一起。

有个名叫Noss的学生，是个日本传教士的儿子，发现下午五点站在社会科学楼出口处，准能碰到派克老师，而且可以跟他一起沿着大路走回家，可以有好一段时间跟他谈话。Noss记得每次走到他家门口，他总是规规矩矩地向你告别。“我多次这样截住他，我喜欢这样做不仅是会有机会和他说话，而且可以感受他的热情。”

我听到有不少人说派克老师的名气是得之于他出名的学生。这句话有一定根据，如果查阅派克老师的著作，一生并不太多，如果把我和我在英国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相比，那就很显然，马老师在我在英国留学期间，几乎每年可以读到他的新书。而派克老师一生并没有出版过多少出名的著作，如我上面所说的，即使有重要的著作也常是作集体成果出版的，但是他的学生中却有许多是出名的作家，而且有不少是畅销书。在上面就说过，我记得在燕京大学初次上他的课时就向他们说，他不是来教你们读书的，而是教你们写书的。这句话并不是随便顺口说的话，而说的是实话，他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固然没有写过多少书，但的确教出

了不少能写书的学生。

学生造就老师，还是老师造就学生原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出于视角不同而所见有异。派克的接班人之一也是他的一个学生，Herbert Blumer说，在他看来“派克博士对美国社会学的强烈影响来自他的著作，远不如他对学生的身教和口授。”派克老师自己也同意这个看法。派克老师的本领是在善于因材施教，跟他学习的学生并不都是出众的人才，但是他能培养出出众的学生。E. 休斯曾注意到派克多次说过社会学要前进，就得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才，并不能等待招到更优秀的学生。”

派克在1937年回答Louis Wirth向他请教“教育的方法”时，在最后的结论里他特别提到“教师要有想象力。一个对人富于洞察力和理解力的教师可以对学生发生强大的影响。”意思是做老师的人要能真正理解学生为人，这正是说出了派克老师自己的体会。休斯说：“正因为这位老师能设身处地的懂得学生，真像是钻到了学生们的心里去一样，他才能感动学生，使学生跟着老师所指的方向走，成为一个老师所想培养成的人才。”下面我再谈一段受他指导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回忆。这位留学生名叫戴秉衡，我在燕京念书时就听吴文藻老师常提到过他，虽则我并不认识他。他的回忆里说：“我是1929年秋季作为一个中国政府资助的留美学生到芝加哥大学来学习的。我很认真的想学到一点关于人性和教育的知识。我战战兢兢地初次踏进派克老师的教室。使我十分着慌的是这位老师一上来就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题目纸。纸上写着一连串社会学的概念，要我们依次写出自己的理解。这些概念我都没有学过，我只能交了白卷。我想这一定会引起这位老师的失望，所以心里就想打退堂鼓了。我在下一堂又去上这课时，他又冲着我们学生每人发了一张复制的印件，写着一个失足的姑娘的故事。他要我们每个人都写一篇对这个故事的想法。我就凭着自己真实的思想写了下来。过了一些时候，派克老师在上课时，把我们交他的答案发回给我们。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当众说全班只有我这一篇文章对这个姑娘失足的故事分析的



最真实。而这个班上大多是来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从此，派克老师每次在校园里碰见我时一定要问我是不是Mr. Dai当我回答没有错时，他总是会对我说，你有分析能力。经过了几次对我这样的说后，我也开始有了信心。结果我就坚持跟他学下去，直到1935年，在他指导下得到了博士学位。我的论文是《芝加哥的吸毒者》，派克老师指导我走上这条心理社会学的研究道路。这时是在社会心理分析学这门学科盛行之前。”

我在昆明跟吴文藻先生工作时，还听到过想请他回国到燕京来开展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如果没有这次抗日战争，燕京大学不停办，说不定派克老师会通过这位学生，在中国传进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

## 十七、再说《引论》

这本《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是以一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给新入学的学生入门的教科书的面目出世的。芝加哥大学是美国设立社会学系的第一所大学，那是在1892年。《引论》在1913年开始由派克和布吉斯一起开课讲授，到1921年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成书本发行，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已有13年。这13年正是这个社会学系从占先发展到领先的过程。一般把这个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称作美国社会学里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不但有它的特点，而且被认为标志着美国社会学的成熟和后来发展的基础。Robert. E. L. Faris 在1967年写了一本介绍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书称作《Chicago Sociology 1920-1932》把这个学派的开始放在1920年，正是《引论》行世之前的一年。不论这个学派的来源和《引论》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成问题的是这本《引论》在20世纪的20年代起代表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旗子。也是在这时期由于这本教科书被美国很多新兴大学所接受，作为社会学的入门读本，同时又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批退役的年轻军人，受政府资助，分配到大学里来学习，各大学里学生人数大增，社会学这门新的

学科，吸收了一大批人才。芝加哥社会学系也提供了各大学新开办的社会学系的师资。这些客观的条件助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名声。加上芝加哥大学在成立社会学系之后又成立了美国的社会学会，出版了《美国社会学杂志》。这个杂志又有个规定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负责编辑，而且成了一个传统，直到1936年另有一个《社会学评论》出版才取消它的独占地位。从1895年开始，一个学系、一个学会、一个杂志三位一体奠定了一个学术界的主导势力。

在美国社会学史上，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的领先地位是公认的。对取得这个领先地位，派克老师出的力是难于低估的，他编辑了这本入门课本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经派克老师用这本《引论》培养出来的社会学者的人数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后来在芝大的那些出名的社会学家，几乎都自称是派克老师的学生。他的一批学生确实占据了美国各大学教社会学的教师中很大的比例。我1982年初次访问加拿大时，也沾了这位老师的光。当时我在各大学里被介绍给大众时，总是带有一句“这是派克博士的学生”，因而受到另眼相看。

上面提到的那位Faris 在那本书里说：“派克和布吉斯所编的那本著名的《引论》被很多的社会学者认为是所有社会学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一本。在这书出版的1921年之前所有社会学概论的内容都是各说各的，相同之处不多。现在凡是各大学讲社会学时内容都和这本书相符合，而不同于早期如Small, Ross, Giddings 和Ward 所写的了。1921年以后的美国社会学，在方向上及内容上主要是按派克和布吉斯这本书所定下的。……这本书给社会学的领域规定了范围。使一个初学者知道从那里入手去寻找、累积和组织关于这学科的知识。”用另一句话说，《引论》真的做到了初学社会学的人的引导者。这就是派克老师想做的事，而实际上他做到了。

这本《引论》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已成为一个里程碑，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如派克老师一再说的，社会学还是一门成长中的科学，什么时候长成，到现在还难说。这本《引





论》对派克老师本人来说并不是个句号，只能说是个逗号。作为一个思想探险者，走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但并没有结束。在年龄上说他这时还没有到50岁，在他的一生中，还刚走过了一半多一些。

派克老师作为一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按他自己说是从他在Michigan大学二年级时，大概是1885年，遇到把他带上这条路的杜威博士时开始的。他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是比较长的。1847年才进小学，那时他已有10岁，到他在Michigan大学毕业已是1887年，23岁了。经过八年的记者生活还进了哈佛大学研究院以及到德国去留学，1903年才得博士学位，已经是39岁了。又经过10年，到1913年才进芝加哥大学，安定下来整理他用了将近30年有意识地观察人们社会生活得来的问题和见识。就是当时他积存在思想库里的储蓄。这时他刚过50岁，实际上他已度过了一生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这本《引论》在他一生中可以说是一个逗号，因为他已走到了作为思想探险者的半途了。

如果说他探险的目标是理解人生，也就是创立一个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即建立一门科学的社会学。这个目标虽则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但是他认为已在长成之中，也就是说已有了个底子，加以培养，可以逐步成长的了。探险的路尚未走完，但终点是已可以望见了，所以说不是句号而是逗号。

派克老师对这本《引论》在他一生事业中的定位是自觉的，有自知之明的。他已看清已走过的道路和还要前进探索的那一段。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他常想到这本《引论》怎样能跟着不断翻新。1932年11月5日他从太平洋旅行回国时坐在Chechaho Maru 号船舱里给留在芝加哥大学的Lonis Wirth 教授的信上说：“我很想和你及布吉斯一起研究一下这本《引论》的未来。作为一本教科书，已讲到了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在思想领域里经过新的研究正在生长和变动。这本《引论》怎样跟上去？”

后来他说他觉得这本《引论》不宜再扩大了，而应当加以精炼。可以考虑把14章浓缩成四个部分，人的本性、社会区位学、个人的

社会化和集体行为。他认为：“在这个计划中，这本教科书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重写和重版。老的概念要以新的发现来评论和重写。这可以成为一个惯例。每一个部分可以由专门的编者分别负责。”

他这个主意并没有实现，因为到了1970年还是按老版本又重印了一次。但是这个想法，他并没有放弃，而且在其后的日子里还在向这个目标推进，这是后话了。

## 十八、另一本老师的杰作

我在这本补课札记的第一节里已经说过我从吴文藻老师的遗书中按他遗嘱挑选了两本书留作纪念。这两本都是派克老师的著作，一本是前几节札记里所提到的《引论》，另一本是《城市论》。这两本书是我用来作为这次补课入门的进口。

《引论》是有1040页厚厚的一本大书。《论城市》和它相比显得又小又薄了。说它又小是因为它是32开本，《引论》比它大了一级。说它又薄是因为它只有233页，不到《引论》的1/4。但是在我读来，它们的内容却在伯仲间。目的和格式又是基本一致的。《论城市》的目的是在引导想学社会学的学生们怎样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现代城市社区。范围比《引论》为小，为专，不像《引论》那样概括和全面，所以也可以说是一本从《引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专论。

这本专论和那本《引论》的产生经过却不同。《引论》是出于布吉斯要开课求助于派克而结成合夥的成果。这本《论城市》是派克以自己已发表的几篇论文的基础上长出来的。关于它的来历要翻出一些旧事来说一说。派克1913年接受汤姆士的推荐进入芝加哥大学，但是由于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当时社会系的主任Small只能用神学院的教授级讲师professorial Lecturer名义把派克接纳到芝加哥大学。这个名义是个没有教授权利的教师。在英文里说是without tenure的。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呆了10年，到1923年才升为正式教授。在这段时间，



他有充分的时间从事思考和写作。《引论》是从1913年开始编写和试讲的，到1921年才出书，可说就是这段时期里的学术成果。

《城市论》这本书是1925年出版的，这时他已经升为正式教授了。但是这本书的形成却在1915年。派克在这书的序言里一开始就说“若干年前有人要我为研究现代城市里的人性和社会生活写一个提纲。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为满足这个要求而写成的。”这篇文章最初分散发表在美国社会学会的会报及其他刊物里。后来加以修改和重写成为这书的主篇。

1913年到1925年其间相隔12年，把12年前的旧作重新亮出来，出于一个不平常的机缘。旧文重亮和派克老师在1923年取得教授地位这件事是直接有关的。当他还是“教授级的讲师”时，他不仅各方面的待遇上都是比教授差一筹。他能在社会学界破土而出是以他1923年升为教授开始的。1925年他就被选为社会学会的会长。作为会长有权决定学会将在该年12月召开的年会上讨论的主题。派克认为这是他推出城市研究的时机了。他从存稿中把10年前写的论文刷去尘灰进行修饰抬升为这次会上的主题论文。而且在开会前一个月，这本用这篇文章为书名的书也编成并交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派克老师在11月2日已把这书的序言写出，赶上12月学会开年会时这书出版发行。

派克老师在这时不忘旧交和引进他进入社会学阵地的恩情，特地邀情W. I. 汤姆士到会宣读“在都市环境中的个人特性问题”这篇论文。汤姆士自从1918年被诬告而脱离芝大之后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学年会。他这次出席等于是美国社会学界为他恢复名誉和地位，即等于我们这里所谓“平反”。当时在社会学界引起了轰动。派克老师这一着也受到了公众的赞赏和尊敬，因此《传记》后记的作者E. Hughes 称之为“派克社会学事业中的高峰”“the acme of Park's sociological career”。

这本《论城市》实际是为当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揭幕。这是一本论文集，除了学派的主帅派克自己带头领先抛出上述的这篇为都市社区的社会学研究奠定方向和道路之作外，还有

派克在这段时期里写的三篇重要的论文，一篇是“报纸的自然史”不仅总结了他11年的记者阅历而且是预为21世纪信息时代作了报春的先声。还有两篇是关于城市居民的心态分析。他除了他自己的论文之外还选用了他的老搭档布吉斯的两篇文章和准备和他合作编写《人文区位学》一书的麦根齐的一篇关于社区的区位分析的文章。特别值得引人注意的是最后一篇由他的得意门生Luis Wirth汇编的关于城市社区的著作目录。这篇目录有168页，占全书近1/3的篇幅。它简直是有关城市研究的指导性的参考文献目录。全部目录分11部分，从城市的定义、发展史和分类到它的腹地，和本身的结构和发展，以及城市生态和居民的心态，几乎把城市研究全面都包括了进去。有了这笔总账，如果按次序的参考阅读就等于读了一本城市学的引论。而且编者还像那本《引论》一样，每一个部分都发表了编者的导言，讲述了这一部分的意义。各部分的导言加在一起，其实是一篇很完整的“城市社会学”的引论。编者这样做表示他从派克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社会学这门科学的精神。

这本《论城市》还是一本集体创作。用四个作者的名义出版。他们正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主将。

上面我已说过，这本《论城市》不仅为“城市社会学”揭了幕，而且事实上带头引导出一系列在派克这位老师所指导下写出的专刊，大多是芝大社会学系的博士论文。这一系专刊都用《论城市》的型式，同样大小，差不多厚薄，一式装订，只是书面的颜色不同。这一系列专刊构成了一套社会学丛书，为芝加哥社会学派摆开阵势。我在1943年初访美国时曾买过一套，但没有时间加以细读，后来这些书都在文化大劫中被抄走了，现在我只留了一个美好的印象。

## 十九、未完成的种族关系研究

派克老师在1917年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邀进行过一段对美国欧洲移民的“美国化”的研究工作。他利用多年和新闻



媒体的关系开始研究美国几个大城市里移民们用原籍语文出版的当时称作“外语报纸”。他看到当时一个从欧洲大陆移入美国的人，要经过一个文化适应过程才能融进美国人的社会生活里。这个文化适应过程中常常出现当时美国各大城市里常见的有如“唐人街”一类保存着原籍文化传统的移民社区。所谓“外语报纸”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他研究了“美国化”的具体过程。同时也为正在成长中的社会学提供了宝贵的内容。后来这项美国化研究又扩充了内容，包括追踪移民生活中原籍传统特点转化的研究，因而引进了派克的老朋友汤姆士成为合作伙伴。结果完成了被认为是传世之作的《旧世界特点的移植》一书，以上种种我在本札记的第13节里已经讲过，不再重复了。

我在这里提起这段旧话是因为所谓移民的美国化问题实质上上和派克在美国南部研究的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关系问题都是不同文化从接触到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常被称作“种族熔炉”的美国，这个问题是它特殊历史造成的，至今还没有消解，因之它一直富于政治涵义。派克老师既要在美国发展社会学这门学科，他的一生自始至终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政治意义极深的问题也决不是他一生中可以见到终结的。他的“美国化”研究的草草结束，而且还有点不欢而散，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派克老师在研究过程中却发展了他的社会学。历史的现实使这一代社会学者无法不面对这世界人类的多种文化从对立、接触、冲突到调协，融合的过程，而又无法摆脱由这个历史过程对研究者个人的冲击，派克老师的一生正是这段历史的例证。

从美国历史来看，500年前这片美洲大陆在欧洲航海的冒险者看来，还是一片“新大陆”。这种看法和说法都和客观事实不符合的。在500年前这片大陆已有很长时间有相当密集的人类居住，而且发展了有相当水平的文化和相当繁荣的经济。但初次到达这大陆的欧洲航海冒险者眼中没有看到，心里也不愿承认当时的现实。他们在这块“新大陆”把美洲原来的居民消灭了或征服了。为了引进在这里开辟的土地所需

要劳动力，从非洲掠夺大批黑人进入，并建立了奴隶制度。这是美国当前所谓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的由来。其实都是来路不同、时间不同到达这“新大陆”的不同民族集团间的关系问题。从欧洲来的移民中又有原籍不同，入境先后的差别。先到的大多是欧洲西部沿大西洋沿岸的白种人，其后离海岸远一些的中欧和东欧内陆国家的居民一批批跟着移入美国。在美国立国初期，所谓种族问题主要是指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接着在20世纪初因为发生了世界大战，美国参战，而国内有着原籍不同的欧洲移民，各自在生活方式上和感情上归属于对抗的阵线，于是发生了“美国化”的问题。派克老师作为社会学家被拉进了这个“美国化”研究计划之中。那次“美国化”研究计划虽然不了了之而告终，但美国的历史还在发展，过去长期以来所碰到的“种族问题”在新的时期里也以新的面貌继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太平洋上的航运日益发达，加上美国西部经济的大发展，东亚诸国，特别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大批涌入美国西部沿太平洋诸州，和当地原有的农工劳动力在就业上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又以“种族关系”的名义成了20年代当地的一个火爆的社会问题。

1923年夏天纽约有一个称作“社会及宗教研究所”的民间团体找到派克教授，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太平洋沿岸各地的种族关系调查计划。这个研究所的主持人名叫G. S. Fisher，原来是个在日本宣传基督教的传教士。这时因为这个地区主张排日的团体酝酿利用立法手段限制日本移民，那些反对排日的团体也团结起来进行对抗，移民问题已成了当时的一个政治问题。

派克不是美国沿太平洋各州的人，但对种族问题是熟悉的，而且1918年曾为研究“美国化”问题到这一带视察过，而且访问过东亚移民。他已注意到所谓“美国化”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种族歧视”。他在1914年为Steiner的“日本人的入侵”一书所写的序言里已经说过“种族歧视是一种本能性的自卫反应，目的是在限制自由竞争。”他一向主张用他所熟悉的社





社会学公式：“竞争、冲突、调协、融合”来研究移民问题。他认为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白种人和亚裔移民的“种族问题”并不例外。根本原因是在该地区开发过程中这两类人的生存竞争，东亚移民的耐劳吃苦，当地的白种人比不过，因而为了保住就业机会乞求政治支持，于是形成冲突。最终解决这矛盾的路子。还是在加速调协和融合，也就是当时派克所研究的“美国化”过程。

派克老师成竹在胸地接受Fisher的邀请，同意参加社会及宗教研究所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种族关系调查计划。他参加的步骤，是按他熟悉的社会学调查方法，首先是实地观察。他从1923年秋起就开始到美国西海岸作实地访问。他找人谈话，找机会家访。一面看，一面记。访问记录中保存了他这次调查的见闻和思考。他特别注重所访问对象的思想态度，以及他们的身世和经历，下面可举些例子。

1923年11月12日他见到驻西雅图的日本领事Ohashi，这位先生认为世界上的纠纷其实很简单。这个世界精神方面的组织跟不上物质方面的组织。西方个人主义太多了。因而认为现代文明不会持久，派克自己在这次会谈中也有启发。他把当地的日本移民和美国南方的黑人相对比，认为日本移民太reserve了一点，reserve一词相当我们所谓矜持的意思，不同于外露的对抗，而是内心的保留。美国南方的黑人对当地的白种人已经从力屈进入于心服，即使在他们对那些一时只有逆来顺受的事，也常以幽默态度加以自嘲。他们心里并不一定乐于接受，但由于明知无力抗拒只能勉强自己予以顺从。日本移民的心态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口上可以不出声，心里还是不甘服输。派克老师这样的分析值得我们学习，他怎样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心态深处。

另一段是关于一个华裔少女的访问记录：这位少女名叫Flora Belle Jan，是一位比较开放的华裔姑娘的典型人物。她给派克的一封信中说：“至少在加州，我想和美国人真正交朋友是不大可能的。我是中国女孩子中闯进过美国家庭比较最多的一个，我所遇到的美国人一般是

和好的，当然也听到过一些不太令人舒服的话。可是最近我和一个出身很好的美国青年相结识。我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但他多次和别人说常常不能接受我的约会，因为他的姐姐有个小圈子，不能容纳我。有时我想我本来不应闯进这个西方的世界。有一天早上我睁开眼，发现自己仿佛搁浅在外乡人的土地上。”

派克记下说，这孩子碰到了种族歧视了。这是一道难于穿透的障碍。有一个华文报纸的记者向调查组说：“自从我到了加拿大，当地人对我们华人的污辱，我已受够了。我在报纸上屡次提出抗议，但是30年来他们却一次也没有答复过我。”

派克老师通过这样的实地观察，搜集事实，像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开始对这个地方的病情作出诊断。他认为这个地区的不同种族之间已经从竞争进入冲突，虽则还没有动武，但已经动了感情。双方个人的成见形成了集体的歧视，对抗的热度已经相当高了。

派克的访问记录里还有一个例子说明个人感情的好恶怎样变成对种族的成见，又怎样发展成种族歧视。他在1924年1月31日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牧场，主人是一个白种妇女，名叫Kate Vosberg。她是在一个中国保姆手上长大的。她对中国移民很亲热，但不喜欢日本移民，因为她曾雇佣过一个日本人作帮工。这个日本人拿了工资不告而别，后来又在附近另一家牧场上出现了。从此，她总是讨厌日本人。她和派克说：“一个人对某一种族都有天生的感情，喜欢或讨厌。我喜欢中国人、墨西哥人以及黑人，但就是不喜欢日本人。”她的儿子曾在哈佛和牛津上过学，说他的妈妈对不同种族有不同的成见，个人的偏见。派克接着说：“问题就在什么场合引起这种偏见的。”我体会这段对话的意思是个人间的好恶都是具体经历造成的，但是个人关系可以化成了种族关系，个人的偏见可以化成群众性的种族歧视，其间有个社会过程。研究者应当抓住这个过程。

派克认为如果群众能明白这个过程，防止个人因生活中发生的具体事情而形成私人间的好恶转化成集团间的相互歧视，种族关系是可



以避免发生对抗和取得协调的。这是他应用社会学理论来改变历史事态发展的见解。

1924年5月26日，派克计划中的这次种族关系的实地调查刚进行到一半，消息传来，美国国会已通过了限制日本移民的法案。两个月后派克收到了东京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告诉他东京美国大使馆前有日本人以自杀来抗议这个排日法案。派克在1926年五月份公开发表他反对排日法案的文章题目是：“在我们的面罩背后，”斥责这个法案在人类精神领域界所造成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这个排日法案对这次派克所参与的种族关系调查也是个致命的打击。正如该计划的一位负责人给Fisher的信上说的，“这项调查原来的打算是一次‘病情诊断’而现在已成了‘尸体解剖’。”作为社会及宗教研究所组织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种族关系调查到此也宣告寿终正寝。虽则欠派克及其调查人员美金二万元的帐没有归回。

1924年8月派克离开太平洋沿海地区。他在给汤姆士的信上说：“这一年真是‘a strenuous year’”，“鞠躬尽瘁”的一年。其实对这位老师说这个结果也不是出于意外的。美国的种族关系上出问题不是从那时开始，也不可能以那时终结。这是美国的痼疾，怎样了结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能下结语。对一个社会学者的派克老师来说，作为一个思想领域的探险者，不过又是一次新的探索，得到的启发和知识还是满载而归的。如果还记得我在上一节里所说的，1925年正是这位老师“社会学事业的高峰”的话，他在社会学会上众口加誉的热烈情况正是在他从太平洋沿海调查结束后发生的。人世的顺逆就是这样交错着发生的。

## 二十、跨越太平洋

美国太平洋沿岸的种族关系调查中途夭折，1924年秋季派克老师挂印东归，从旧金山回到芝加哥。从他一生事业上说这次调查没有获得预期的收获。他在一年多时间里，动员了从洛杉矶到温哥华沿岸的12个大学的教师和

210名工作人员分别在各地参加了这次调查，写出了有600份报告，一共有3500页。在当地知识界是一次空前大规模的合作行动，对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对派克老师本人来说，他早就心中有数，种族问题在美国是个长期历史形成的深入肌脏的痼症，决不是短期可以治疗平复，但他相信待以时日终究会解决的。而且他也深知这个所谓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还有待深入研究和用理智来扭转群众感情上的成见和歧视。他在考察西海岸东亚移民时接触到中国和日本的移民，受到很深的触动。他这时已经有50岁了，但是他在这半个世纪里，足迹还没走出过欧美两洲，他一直在西方文化中生活。尽管他接触了美国南方的黑人和这些黑人从非洲带来了一些不同于欧美文化的遗留，但由于他们长期处于被歧视和被压迫的奴隶地位，已在心态上屈服于欧美文化。

派克老师虽则尽力去体会种族关系里的心态现象，但他所接触到的现实并不是平等地位上的不同文化载体间的关系。我并没有听过这位老师所讲的种族关系的课程，但是从课程的标题本身和所公布和简介来说，他还是沿用着美国通行的种族的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涵义很露骨的表明是着眼于体质的区别。在美国流行的区别种族的标准是皮肤的色素。在派克老师这个课程的简介里就提到这是讲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种族是用皮肤的黑白来划分的。后来由于种族歧视把亚裔移民称作有色人种。黄色皮肤和黑色皮肤可以归在一类而和白色相对立。这种概念本身不是科学的，因为真正引起不同移民间产生矛盾的是社会竞争。竞争中的优劣出于各自的文化素质而不是体质，更不是肤色。这一个根本认识上的误导是所谓“种族矛盾”的由来。我没有上过派克老师这门课程所以不敢多说。但有见于美国至今还在受这个概念本身的误导，直到最近所谓文化冲突论，果然承认了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反过来又受到了种族概念的误导，认为文化和体质一样难于改造的，结果导致文化差别必然会引起民族冲突的结论。这里值得美国文化自己反省，怎样



从历史形成的痼疾里自己拔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派克老师从这次太平洋沿岸地区移民调查，给了他面对东方文化的机会。他在和日本移民的接触中已用了矜持 reserve 一词来描写他们的心态。我的体会是他看到了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内心抗拒的反应。他又从日本人的茶道里体会到这些十分定型的规矩，是从几代人的实践中养成的。那就是说他已承认各民族的性格是文化的传统。不同民族间能不能相互理解不是决定于体质区别而是社会文化的差别。他沿用美国通行的“种族”这一概念正说明他终究是个美国的学者。受着美国文化的塑育，即使他已感到了把文化隔阂看成是体质上的差异是错误的，但要想冲出自身文化的烙印何其难也。

派克老师在离开旧金山启程回芝加哥时对他的同事说，他对日本文化有点着迷了。他表示要赶紧在它消亡之前亲自去看看这个东方的雅典。这句话使我感受到他已看到了太平洋对岸有一种文化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入侵，它会不会像西方的雅典一样在历史中消亡，他那时还没有信心。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文化的载体不同于他在美国南部所熟悉的黑人，也不同于在研究“美国化”时所见到的欧洲各国来的移民。所以当时他的反应是急于到东方亲自看看。我认为这种心情正可以说明他已从狭隘的种族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这个矛盾的文化实质了。

派克老师看来是个相当性急的人，当他看到了这个思想探索的新大陆时，很快地想进行一次新的旅行，走出美国这个小天地里的“种族问题”，立即投入包括全人类在内的全球一体化中的文化关系问题。他是1922年说出想到东方去的，1925年他得到了一个没有预想到的机会。这时有个称作太平洋学会的团体，邀请他在六月份里去檀香山参加该会的首次会议。这会的由来我不清楚，虽则后来在40年代它和我也有一度比较密切的关系。1925年的这次集会据说到会的人并不代表什么团体或国家，但我不清楚谁决定那些被邀请人士的名单。反正派克老师是被邀请了。他对这次会议很认真。启程前还起草了一个调查提纲，包括檀香山的历

史和种族结构及其关系，甚至把民间传说都列入调查项目里。但看来他这次旅行中并没有进行社会调查，但认识了许多趣味相投的人士。会议后，他又到附近太平洋上的岛屿上访问了一圈。

派克老师从1923年起在太平洋周围甚至远及非洲的“行行重行行”一直到1933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一共有10年时间，他一面到各地访问，一面写出零星的札记和文章，并在各大学讲学和演说。

1922年11月太平洋学会在日本京都开会，派克老师如愿以偿地首次达到日本。同行的夫人在家信中说：“老先生真正地感觉到心情舒畅。他由衷地认为这次会议正中下怀，因为他认为与会者都知道他们想在这里做些什么。”他在日本过了冬到翌年3月23日才离开。他并未立即返国而是去了印尼，又从印尼到新加坡和菲律宾，然后到达上海，这是他首次到中国。他原想到北京畅游一番，但是在南京病倒了。出院后，又赴日本赶上太平洋学会的会议。

在旅途中他搜集到许多有意思的见闻和种种新的想法。但后来说“可惜我回来后都忘掉了”。他对具体的事实不一定都记得，但这些事实所引起的兴趣却保留在脑中。他见到了东方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相互间的接触深入心中，使他对原有思想的反思和更新。他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日本的酒楼里看到一个条幅，写着“酒香、和平、友好和互相称颂”但是当他问一个侍者这上面写些什么，答复是各种酒的品牌。他听了之后很有感慨。认为文化之间要能互相了解是十分困难的。缺乏共识怎能从成见里走得出来？派克老师是从种族隔阂看到了背后还有一个文化差别的问题。

派克老师于1932年8月取道檀香山和日本直奔北京，在路上在给檀香山的一位曾是他学生的朋友的长信上说，“我希望把各个存在种族问题地方的人组织起来，能合作进行共同的研究。研究中心一个可以设在檀香山，一个可以设在南非。我即将去印度、南非、南美等地方考察。看看这些地方的人怎么想法，有没有人想研究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合作。”





又说：“我们可以先从生物的角度开始去看种族关系，看看那些地方是否承认混血的居民。然后进一步去观察这些混血的居民在文化上有什么反映。在檀香山就可以搜集一些这种混血居民的生命史，看看他们说什么语言，对异族间的通婚具有什么动机等等。这种工作不能在短时间完成，要和他们混熟了，慢慢地谈出来。”他在这信上把这次旅行的目的和工作方法都说清楚了。

派克老师到达北京后的情形我已在这份札记的第二节“派克来华”里提前讲过，在这里不再重复。他在这年圣诞节前夕离开燕京大学，如他在上面这封信里计划的从北京到香港、西贡、新加坡和加尔各答。后来又从印度经莫桑比克和南非的Johannesburg，这次旅行的跨度相当大。直到1933年的春天才返抵芝加哥，这个夏季他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了，当时已是69岁。

他曾一再说过，没有在中国居住到20年之上的，最好不要写关于中国的文章。他自己也以此自律，所以在发表的文章中很少提出他在中国的访问，但是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还是坚持请他留下一些话作为临别赠言。他不好推托还是写了一段话留在北京。这就是收在《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里的“论中国”一文。我在这次补课中又翻出来读了一遍。

派克老师在这次旅行中看到是抗战之前的北平，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面貌，在一个从当时已经工业化的美国大都会里来的学者，自会有他特具的角度。这里看不到美国黑白之间的“种族问题”，也不存在美国各地的多种原籍的移民，没有“美国化”的问题。这里有的在这位远客的眼中是一个他所谓“已经完成了的文明”。在这样的文明中“任何一项文化的特质无不相互正确的配合……给人一种适合而一致的整体印象”。派克老师在另外一个场合把中国文明比之于一种章鱼Octopus 它能用多个触角伸向不同方面，把别的东西包容进来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正是派克老师所说的融合，他看到这是和“靠征服而生长”的欧洲民族扩张的过程是不同的。他实际上已在考虑全球文

化的未来。可惜他似乎时间不够进一步深入下去，他被古老的中国文明所迷住了，尽管他也到过“和欧洲都市无异”的上海，但是这个正面临激变的局势，对他印象不深。他如果真的在中国多住20年，他的看法也许就不同了。

## 二十一、人生苦短，探索未已

派克老师横跨太平洋，绕道南非的环球旅行，是从1932年初夏的8月起至1933年的春天止，几乎有三个季度。这次“行行重行行”对这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是最后一次壮举，但他原来打算在亚非两个大陆的知识界里组成一个合作的研究力量的宏图并未实现。这时离他70岁的生日已不到一年了，他回到芝加哥不久就准备办理退休手续。这是年龄的规定，生物性限制，谁也无法躲避和推迟的，但是他对此没有低头。在南非时写信给他心里打算合作写《人文区位学》一书的伙伴，他的一个名叫麦根齐R. D. KeKenzie的老学生，信上说：“我要尽可能地把我的思想都写进这本书里，不然我怕我这一生将怀抱着脑中的许多东西没有见世而我已弃世而去……。你将会高兴地知道我虽年已69，但自己似乎觉得生命力没有比近来更旺盛的了。我希望在去世之前还能做很多的事。”

至于他计划中和麦根齐合写的那本“人文区位学”早在他和布吉斯合写的《引论》出版后不久提出的修改意见中已经列入分别要写的四本续编之中。

关于人文社区学本身说来话长。我在上面第12节“派克老师在备课”里已说过他怎样从博览冷门书籍时得到“人文区位”的启发，而且他认为这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和值得探索的一个思想领域，甚至向他儿子提出建议作为自己的专业来考虑。尽管他儿子并没有接受这意见，但派克老师自己却一直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传记》的作者曾说，“派克对社会学的爱好，最初是新闻媒体在1908年已经看中了。1903年初次动情于集体行为，1912年结识了种



族关系，最后倾心的是人文区位，到1921年才开始在他的著作里公开。

人文区位学英文是Human ecology，是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Ecology最早是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rnst Haeckel最早采用的名词，字根是希腊字Oikos，意思是“生活的地点” the place where on lives。

生物学里的区位学是研究植物和动物生长的地区和其环境的协调关系，用以理解其兴衰消长的现象。派克教授认为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群体居住的社区。在《引论》中说“社会的经济组织作为自由竞争的一种结果，就是它的社区组织。因之，在植物及动物区位学外还有人文学。”1920年派克开了一门课程就称作人文区位学。在课程简介里说“决定社区的地址和发展的地理和经济因素，社区的不同类型，贸易地带，交通和运输形式的作用，贸易及其服务的分布和分散，社区问题的背景。”1930年他写了六篇文章阐述人们生活上表现区位格局的具体例子和理论上的阐述。他提出许多社会学上的重要概念如生活网络，生存竞争，集体行为，社会的生物基础，和社会平衡等等。他指出人类的社会之所以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的社会就在于建立在不同的水平上，人是在文化的水平上，而动植物是在生物的水平上。

在生物水平上主要特徵是竞争。在植物和动物中竞争是有限制的。这样形成的群体是无政府状态的，是自由的。而在人类却不同。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是有限制的，受到风俗及共识的限制。人的社会超出了生物性的竞争并采取了高级的和复杂得多的种种限制下产生的。

他1918年在课堂上曾举过一个植物界的例子来说明区位的变化。在北Carolina Piedment的一块农田如果放火烧过抛荒后，生物学家可以预言，五年后这块荒地就会杂草丛生，到第6年可以散播松树的种子，下一年将会看到一片松苗，这片松林如果在150年后又种入硬木类的树苗，250年硬木林就会取代松林。这是说一种植物会在一块地上在一定时期里取代另一种植物。他接着讲他在1933年在南非看到的情形。

他说最早居住在这里的是Bushman，他们以狩猎为生。然后来了Hottentot人，他们还是从事狩猎但是开始了畜牧。他们和Bushman发生冲突，因为Bushman用毒箭射杀Hottentot人的畜养的牲口。结果是Bushman被赶入Kalahari沙漠。后来又来了Bartu人不只是狩猎和畜牧，而且开始耕地和种植Kaffir corn了。其后又有Boers进入，居住在Transvaal和Orang Free State。他们把当地的土著都征服了，并把他们作为奴隶又占有了土地，组成大家庭，实家长统治。最后英国人来了，这里发现了金刚石，英国人就长驱直入。1887年又发现了金矿，1884年建成了Johannesburg一个巨大的城市。南非就是这样从孤立和封闭状态进入了国际社会和新的世界性文明。

这里看到一个地区居民的继替过程，原始文化的居民需要广大土地来养活他们的人口，最后谁能最善于利用这片土地的人占据了这片土地。

派克老师在他所谓人文区位学里最重要的核心在他把人文世界分为四个层次，基层是和动植物等同的，称之为区位层或生物层，住上升一层是经济层，再升一层是政治层，最高是道德层。

他还有一个突出的见解是层次越是向上升级，人的自由就越是递减。因为他认为人和其他动物及植物的差别是在人用文化来制约自己。他说“有意思的是这几个层次像是堆成了一个金字塔。区位层是基础，道德层是最高。一个人完全进入了社会秩序也就是全部生活都被组织在群体里，处处要服从整体的意志了。竞争是发生在基层生物性的自然秩序里，植物和动物群体里的个体是不受群体节制的。到了文化层，个人的自由就完全受群体的习俗、意识和法律的控制了。”他说从个人来说，自由的要求也是跟年龄而变化的。儿童时期谈不上自由，成年后为自由而斗争，年老了，也不那么想自由了。1934年在芝大一次公开演讲里说“人总是在想摆脱社会对他的拘束，想得到自由，要摆脱的是什么呢？还不是社会定下的要他们遵守的规矩么？”他收入《城市论》这本书中



他写的一篇文章“社区组织和青少年犯罪”中更耿直的认为群体生活为人们立下了种种限制人们行动的规则和法律。青少年不接受这些人为的限制，就成了违法、犯罪。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要的是自由。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犯错误。派克老师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而是要指出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层次的矛盾。他这个看法反映了当时美国正处在社会激烈变动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38年他说“现代的世界看来欧洲的经济正在重复罗马帝国兴亡的轨迹。商业正在破坏古老的秩序，为扩大生存空间而争斗。这场争斗会建立起新的体系。新的生物性的基础正在给新的世界性社会奠定基础。派克不相信任何平衡状态是永恒的。变动是不会停止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人文区位最终的任务就是研究生物秩序和社会秩序两者如何取得平衡的过程，以及一旦两者的平衡破坏后，怎样重新取得调整。也许可以用潘光旦先生的位育论来说，这就是“致中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要位育于天地万物之间。

这些有关人在天地万物之间的地位和发展的种种思想，在派克老师的一生中不能说已有成熟的看法。他本来打算和麦肯齐合作把这方面的想法写成一书，而且在1924年7月麦肯齐也回信同意了个建议，他仅在这年的秋季在华盛顿大学开了一门课程称人文区位学。1925年，在社会学会年会上专设一组讨论人文区位学。1926年和1932年派克自己在芝大开了这门课程。在1937年派、麦两人又会合在一起花了一个暑期为该书写出了42页的大纲。这份大纲主要是要讲明，人的集体生活里在一般所谓社会层次之下是否还有一个共生的或区位的层次，以及这两个层次即区位秩序和政治道德秩序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是怎样的。他们还在1933年和Ronald Press签了出版合同。但是这本书始终没有完成。这事的经过和原因我们不必去追究了。总之“人文区位学”是派克没有能及身看到它成为一门学科。他提出的基本问题也并未得到最后的结论。

派克老师没有能安心下来完成这本“人文

区位学”的一个原因是他在1936年秋季应邀到Fisk大学去讲学。地点是在Nashville。这是美国大学联合会把它列入A级的黑人大学。我们不必去揣测为什么这位老师要把晚年花在这所大学，而且一直呆到他离开人世，一共8年，从1936~1944年。他又不愿意听人说这是为了他对黑人特别亲热，有点偏心黑人，因为他一直反对用感情的偏向来看待种族问题的。实际上，他在这8年里经常往返访问美国及加拿大各地。自从他环游世界回来后，美国公路网和汽车产业大为发展。他这时也购买了一辆当时新式的Ford V-8。但他已年过70，并没有学会驾驶，但是总是有学生愿意为他开车，因为在车上可以听到这位老师的种种高论。他在这段期间里的确用汽车访问过很多地方，在别人记忆中留下大量值得追忆的印象。

八年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不幸的是在他弃世之前的1941年12月发生了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我并不知道他当时的反应。矜持的日本人到这时候暴露本性了。美国果然最后以原子弹报复了日本的偷袭。但这笔种族关系上的帐应该怎么算法，我只有在另一世界里去请教这位老师了。

他对这次世界大战有一些看法在生前表达过。他觉得贸易将为新的世界社会打下生物性（区位学的）的基础，但是从社会层来说却有一堆如碎片般合不成一块的众多国家，这个状态并不妙。1939年曾说“看来有一种类型的社区，它的成员间在生存上相互倚赖，要分也分不开，但它们一起的集体行动却什么也发生不了，我们现在也许就处在这种状态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已进入共生（Symbiosis）的关系之中，但是无力采取集体的行动（Collective action）”。

看来我们这位老师这时是很失望和困惑的。他在答复战争是否和地狱一般？他说这很难说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战争还没有恰当的概念。有人问他信什么宗派，他回答他信过不同的宗派，最后觉得宗教本身是一个健全的个人和美好的社会不能缺少的。他在1944年春的音乐艺术会上说，“建筑在机械基础上的世界秩





序一定会被一个建筑在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所代替。一个由商业和外交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必须以人和人间的友谊和道德来支持。音乐、戏剧和艺术比了语言这种理性的交流更为朴实和直接。”1944年他在“现代世界的使命”一文中在思索，在这个激烈变动中的世界里人们在惶惑那些被认为领导他们的人心中是否有底，他说“我们像那些希腊的思想家那样站在一个新的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是新的，我们感觉到不论是看不到全面的人或是见闻有限的实行家，甚至具有科技修养的人，包括社会科学在内，能对我们有多少帮助。”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派克老师还是不肯停下来。1943年6月中他还是到南Dakota乡间去视察农民收获土豆。这原来是块穷地方，他看了高兴地说“他们翻身了，土地又绿起来了。满地奔跑着猎物，鸟在树上歌唱。”但不久到了夏天他犯了一次心肌梗塞，他感到事业还正在开始他怎也舍不得放下。1943年10月他给儿子Edward写信说：“我想到很多东西要告诉你，我突然觉得劲道又来了，像是埋得很深的根上又在萌发新芽。我相信至少我在这里还可以再过一个夏天。”

他在医生警告他此生的日子已不多时，他想起了要写他的自传。他告诉他的朋友休斯说，“我要写下我思想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my mind）他所说的自然史是一件东西自身的发展过程。他自己明白他思想里的各种想法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变化和发展的。他想把这些思想的变化过程写下来。他在这年的2月10日给他女儿写信说，“我要把我对人的本性和对社会的本性的看法都写出来成为一个记录。不是为了家里的人回念我，而是为了研究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人留下一个自述性的文件。”

他希望他的孙女Lisa能帮助他写这篇自传。10月18日去了一信，信上说：“你九月里的来信我已收到。我曾想立刻复你，但是那时我身体不行，心跳得像只小猫，血压上升，遍身寒冷，我心里不痛快。现在我好些了，所以想给你写信，告诉你一些想到的事。你说你想写

一本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小书，这是个很好的计划，即使不能像你所想的那样写出来。

我要想跟你说的，第一件是赶快学会中国话和中文。我昨夜没有睡着时想到如果我要写这本书应当怎样开始。我想我要到北平去，如果日本人允许我。我要熟悉这个城市。北平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至今还没有人把它好好地写出来过。它有三道或四道城墙，合而为一，中国城、满洲城、和紫禁城，还有个多少是欧化了的城。其中三个各有自己的城墙，一个套一个。中国的城墙本身是个有意思的题材。北平的地下世界，我曾见到过一些，因为我访问过一个出售查获脏物的市场，我也读过一个惯贼的自述，他讲了怎样躲避警察追捕的故事。我不能把有关这城市的故事都告诉你。你和Peter自己去看吧。好，我不讲有关北平的事了。因为老实话我对它并不知道多少。但是我满怀希望能多知道一些。麻烦的是“时间太少了。”我正在读一本John Marguand写的书。书名就是“时间太少了”（So Little Time）。他一遍一遍地重复这句话，我自己甚至每个小时也跟着他在想“时间太少了”。但是你和Pete有的是时间。我劝你们马上做这件事，越快越好。一定能享受到这次旅行的一切。”

发出这封信后，在该年的12月中旬，他的病又告急了。到1944年二月七日结束了他的生命，据他朋友Brearily说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思考法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传教士对文化传播等问题。另一个朋友C. Johnson说：“他的脑子不停的在思考，他从不丧失对生命的热情，在探索人的行为的边界，即使在最后日子里，不能说话的时候。”

如果他多活7天，他就到80岁的生日了。

## 二十二 后记

以上的补课札记写到21节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说明了为什么想到要补课，为什么从社会学入门课补起，为什么想到派克老师。同时也讲了我打算通过搞清楚派克老师的一生经历来帮助我理解他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经过使我能



进一步学习他的社会学。

这次决心补课是前年下的主意，1998年6月开始温习旧课，到现在已快两年了。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补课这件事并没有结束，而且可以说越补越感到自己学识的不足，越是想补，看来在知识的领域里我到了老年才开始真的踏上实地，真的明白了自己的贫乏，因之越来越想补，没有个结束和完成的界限。人生也许就是这回事，有始而没有终。但人是有终的，我到此告了一个段落再说。

我现在感觉到这个补课的决心是下对了。在这两年里我的确有点乐在其中，使我觉得心上总是有事要做，日子过得很容易，同时也比较踏实，有个奔头。

这次补课自己觉得也很有收获。以前我也读书，但总是有点不求甚解，不常联系自己。这次我从派克老师的一生经历入手去看他的社会学的长成，这就把我拉进了他实际生活去看他的思想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学术思想是不能不从学人的身世和他所处的时代相结合的关键上去把握和去理解的。这样入手，使他的社会学活了起来，他的社会学也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的面貌，个人和集体一旦结合就越看越有滋味越有意思。

我取得这种补课的方法，不能不感谢 E. Hughes先生1979年送我的这本《派克传》。这本书是罗森布什 W. Raushenbush写的。我在补课开始时的确不知道这位著者是何许人。这也说明我读书不认真。其实在这本《派克传》书里就几次提到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曾在派克教授研究外籍移民的美国化问题时和后来在太平洋沿岸调查种族关系时都当过派克老师的助手。我最初阅读《派克传》时这个名字竟在眼前滑过去了，没有注意，到今年一再重读时才注意到。

我要感谢他因为他这本《派克传》启发了我结合派克的生平来读派克社会学。不仅在补课方法上开导了我，而且实际上给我提供了这位老师一生的基本事迹，成了我写这本补课札记时最基本及最得力的依傍，我称它为我写作时不能缺少的拐杖。

我写完了这份札记时才恍然大悟，罗森布什这本《派克传》原来是实践派克老师临终前所表达的一个遗愿，就是他想写一本有关他的思想的自然史。他自己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这位老助手最终按这位老师所主张的写自然史的方法，写出了这本《派克传》，而且赶上我在1943年访问美国前出版了。这一联串的机遇，使这本书能传到我们手中，而且经过不少看不到的运作会在我想写补课札记时出现在我手上。

“自然史”是派克老师在史学上的创新。这是一种写历史的方法，作为对一件史实始末经过的记述。派克老师的遗愿是把他社会学的思想怎样发生、修改和发展的经过写下来供后人参考。他的老助手就按老师的遗愿写下这本《派克传》，又由老师的门生休斯先生写了序言和后记，还亲手送了一本给我。这段因缘是客观历史事实，当我明白了这段经过，对我不能不产生这是天助的感觉了。

我在札记里已谈过罗氏的《派克传》其实是美国社会学自然史的一部分。它不仅叙述了派克老师怎样从一个密西西比河上的儿童长成为美国有名的社会学家的经过，而且也讲出了美国社会学成长经过中的一段重要的部分。

写这本补课札记时还有一段衷曲在我心头，那就是我这一生也许最后还可能完不成的一个自己承诺的任务，“重建中国的社会学”。这件事的来由我不必在此多说，我之所以要补习社会学的实际原因是我总觉得我这一生有一樁事还没有好好交代。那就是我答应带头在中国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这是20年前的旧事。实际上，即使我再有20年，这个诺言还是难于实践。同时我届时还会感到不太甘心。

为了在中国重建社会学我已花费了20年，没有如愿实现。我只能怪自己能力不足，因而还想通过补课再补足一些。在补课时心里也总是系念着这桩心事。如果有人愿意读这些札记，希望也能理解我这番心情。

我在这时又找到派克这位老师，一方面是为了要把我一向主张的重建社会学的来源理一理。我所学到的社会学以及怎样去搞这门学



科，实际上受了派克老师的影响。派克老师要建立的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是实证性质的，就是杜威所提倡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用派克老师的话来说是以实际社会生活为基础得来的科学认识。从实际社会生活里长出来的科学知识。用现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以我个人说我这个做学问的基本道理可以说最初是从派克老师口上听来的，那就是上他第一堂课时他说他不是来教我们怎样读书而是要教我们怎样写书。从1932年到现在已经过68年。这68年里我的确按他的教导写了不少书。书里说的话是不是符合实际，是可查可考的，身后自有公论。领水思源，我不应当忘记这位老师。

现在来说派克老师究竟已是个历史人物了。他的教导是不是已经过时，我们应当想一想。现在时行的是开口闭口讲“后现代”，而派克老师所处的时代至多只能说是现代的初期，就是美国进入了机械化城市化时代的前期。我在写这位老师的早年时特地指出，实际上他所诞生的美国中部地区当时还刚刚踏进机械化和城市化的初期，甚至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儿童们还尝到过乡土经济的味道。他到10岁时才有小学校可进，他的父亲从南北战争退役回来在小镇上开办一家小杂货店，也许可以说明和我们当前沿海地区的小城镇的景况还相差不多。如果说派克老师现在是过时了，但他的一生中还有一段和我所熟悉的生活是相似和相近的。他的思想正反映了美国机械化和城市化这一整段的变化。我们口头上尽管可以多讲讲“后现代”而我们的生活实际也正处在踏进“现代化”的初期，就是机械化和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从这个历史阶段的比较上我认为不是“过时了”，而甚至可说是“正当其时”。

以社会学的处境来说，派克老师给它当时所处的定位是“还在生长中的时期”。我们现在在自己的社会学所处的地位，也许还不够“生长中”的水平，严格一些说也许只够说还在“摸索阶段”。因为我有这点体会所以在补课时，我直觉到这位老师所碰到的境遇我还可以觉到比较亲切。我还认为当前我们一下就想学会“后

现代”恐怕还不太实际，我们还是向世界上其他先进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多学习学习为好。如果我这样说是有一些道理的话，应当认为我从重温派克社会学入手来吸收一些我们“重建社会学”的养料是做得对头的。

我记得提出“重建社会学”的任务是1978年。不久乔木同志就打发社会科学院里一批研究人员去美国访问。原定乔木同志要亲自带队去美的，后来改由宦乡同志出马。我也参加了这个队伍，虽则我头上的“摘帽右派”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我的任务是去看看当时美国各大学里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情况。我在这次访问中特地去找我的老同学杨庆堃先生。他是和我一起1932年在燕京大学听派克老师讲课的人。他从燕京毕业后就去美国留学，继续学社会学。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种族歧视受到群众的冲击有了改革，开放许多禁地，到那个时候有色人种才也可以进入大学里当教授，享受tenure。我这位老朋友因而在匹茨堡大学里获得了社会学教授的地位，而且当我去访问时，他在教授中又获得了一个荣誉的名衔。我们多年的友谊和共同的志趣，把我们又拉到了一起。他不仅同意全力支持我们在中国重建社会学。我们一起策划了一个具体的培训社会学教师的计划。由他邀请匹茨堡大学社会系教授出马帮助我们实行这个计划。他又因为曾经有一段时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过社会学这门功课，而且帮助他的学生去美留学和返港办系，他又具备动员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力量使他们参加我们的培训工作。这两股力量在我们重建社会学的工作上发生事实上的推动作用，而且无偿地提供了这种无私的助力。没有这位老朋友的鼎力协助，我们连那个速成班性质的培训计划都搞不起来的。我借这个写这篇后记机会记下这一笔历史并对我的老朋友老搭档表示深切的铭感。他是去年谢世的。他叮嘱家人，不向同人们发送讣告，和不受吊唁。我尊重他的遗嘱，只在这里加这一笔，以纪念他对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关怀和所做出的贡献。

我这本札记写到这里决定告一段落，从诞生到逝世，派克老师的一生我已大体上讲了一





遍，但是我已说过他的社会学思想并未结束。他的思想库还有很多东西他带走了，特别可惜的是他对这个世界当前的大变局已有所先见之明没有更明白更具体的写出来。他只从他所打算写出来的人文区位学里提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将要产生一个全球化的共生体系，但没有相应的在其上层的共识体系里完全一个道德秩序。这是他的诊断，当前我们所碰到的种种困惑，根本原因就出在这里，我认为这位老师是有科学的预见的，而且也已经指出了我们努力的方法。我在结束这篇后记里应当提出这一点。

共生体系和共识体系是派克老师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即他这方面思想理论的关键词。共生体系英文是Symbiosis，共识体系英文是Consensus。他是从“人之异于禽兽者何在？”这个问题上下手看到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他有智慧，人心可通，在心心相互可以相通的基础上，在群体中形成共识。群体不是人的特有，鸟兽亦可以同群，但鸟兽的群体里的个体间没有性灵上的相通，就是缺少这一点“智慧”，它们和人类差了一级。派克老师讲社会，社会和群体有别。群体就是聚众成群，群体里的个体要能互相了解，有个共识才成为社会。鸟兽可以有群体有集体行为，但没有社会，不能像人类一样个人之间可以相通，在认识上能取得一致，建立共识，这个共识可以代代相传，而成可以积累的文化。文化应当说是人类所特有的，世代相传的。人是有历史的动物。群体和社会的区别就是派克老师所说共生和共识的区别。共生是生物界的共同现象而共识和在共识基础累积的文化和历史是人所特有的也就是“人的特性” Human nature。共识这层发生了一个他所说的道德秩序或道德层面。这个层面是人类所特有的。

派克老师的人文区位学是要把人作为和鸟兽相同层面的这个生物人怎样发展成和鸟兽相异层面的道德人的过程分析出来和讲解清楚，成为科学的社会学体系的一部分。这本人文区位学在派克老师的知识库里没有达到完成体系的程度，至少是没有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使别的人有共同的认识，成为有此共识的人的文化，在人类中推广和传袭，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这是他的一部未完全的曲调。有没有继起者把它完成，那是难说了。

派克是个好老师，而我不是个好学生，很多他早在70年前已说过的东西，我要到老来才仿佛有点一知半解。对他这部未完成的曲调，我只能理解到现在我们这个所谓人类的“后现代”时代，也许其实正是个派克老师曾指出过的那个已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共生体系还缺一个相配套的共识或道德体系的半完成状态。而当今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人类责任也许就在把未完成的完成起来。

在这里我想到了另一位老师，死在我怀里的潘光旦老师。他在70年前已经用中国语言表达了派克老师用拉丁语根拼出来的英文字来表示的人文区位学，潘光旦老师用了我们二千年前老前辈孔孟的经典上的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至少是相通的意义。我们中国文化里的老话就是潘老师所提出来的位育论三个字。我在这篇后记里大胆地把两个老师拉到了一起。我不是个好学生，一个老师的书还没有温习好又牵出了另一位老师。人生苦短，我手边还有多少块钱，可以供我这样去销花呢？

最后我想在这篇后记里声明的是有朋友曾建议儿不必把罗氏的《派克传》作拐杖，不如老老实实把这本翻译成中文的完整。我原本应当接受这位朋友的意见，但是我早年所学的英语已经老化了。英文书籍阅读时都常感到困难，不仅常要查字典，而且发现我用的字典也许已陈旧过时，很多生字查出来的译文，用到原文里去，我还是弄不清究竟什么意义。只能凭感觉猜测。要认真翻译我已做不到了。

我还是用《派克传》作拐杖为好，我看着这本书，要用那一段就用那一段，看不懂的就略过了。我还可以顺着我的思想加一些话，就加一些，我也可以不用拐杖自己跨步，按自己的思路写我的札记。我在这里说清楚我用札记两字就是指这是写来为自己备忘之用，不是为别人写来传达什么别的用意的。我在自己备忘录中要写什么就充分可以自主，自由思索，自由表达。当然写出来之后，有人愿意看我并不反对，那是别人的事。在我说我的备忘录不仅



为自己备忘，也可以为别人备忘。我只求写札记时不受拘束而已。

最后我应当对为我这次补课和写札记服务的人表示我的感谢，我究竟有了点年纪了。做事不可能太利落，不求人。我要借书，还书，要写稿，抄写，打印，样样要自己来做，已经不行了，我处处要求助于人。再说一句，对那

些为我的札记出过力的人，我表示感谢。

2000年3月15日

(全文完)

· 学人艺苑 ·

I felt levitated and cold  
Flying to an unknown land  
Where heaven and earth undivided.  
Cradled in a soft cloud  
Over hills and dales in flight  
Was I imagining? Was I actually aloft?

Yes, I was winging  
I could look down and see  
The empty bed without me.  
I see a parade of scenes  
And landmarks of my past.  
Why and where I could not understand

A desire to be my own  
A wish soon granted.  
I was soaring and gliding  
Over tree tops and mountain peaks  
Was I a feather airborne  
In an effortless flight?

———潘光迥 (1904-1997), *I Closed My Eyes*

